

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编译丛刊



【美】斯蒂芬·万麦金农 著 牛秋实 于英红 译 张学继 审校

# 中华帝国晚期的权力与政治

袁世凯在北京与天津 1901—1908

Power and Politics in Late  
Imperial China: Yuan Shi-Kai  
in Beijing and Tianjin,  
1901-1908

013051302

K827  
1811

# 中华帝国晚期的权力与政治

【美】斯蒂芬·罗麦金农 著  
牛秋实 于英红 译

袁世凯在北京与天津 1901-1908

张学继 审校



Power and Politics in Late  
Imperial China:  
Yuan Shi-Kai in Beijing and  
Tianjin, 1901-1908



北航

C1660003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天津人民出版社

K827  
1811

## 图书在版编目 ( C I P ) 数据

中华帝国晚期的权力与政治：袁世凯在北京与天津  
1901~1908 / (美)麦金农著；牛秋实，于英红译.—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2013.4

(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编译丛刊)

ISBN 978-7-201-07797-0

I. ①中… II. ①麦… ②牛… ③于… III. ①袁世凯  
(1859~1916)—人物研究—1901~1908 IV. ①K827=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279175 号

著作权合同号 图字 02-2009-93 号

本书由版权所有者、作者(美)斯蒂芬·R.麦金农授  
权天津人民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中文版。

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出版人：黄 沛

(天津市西康路 35 号 邮政编码：300051)

邮购部电话：( 022 ) 23332469

网址：<http://www.tjrmcbs.com.cn>

电子信箱：[tjrmcbs@126.com](mailto:tjrmcbs@126.com)

高教社(天津)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3 年 4 月第 1 版 2013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880 × 1230 毫米 32 开本 8.625 印张 2 插页

字数：150 千字

定 价：30.00 元

# Power and Politics in Late Imperial China

Yuan Shi-kai in Beijing  
and Tianjin, 1901–1908

Stephen R. MacKinn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Berkeley • Los Angeles • London

## 总 序

纂修清史是我国新世纪标志性的文化工程,它包括 3000 余万字的清史主体工程及文献、档案整理和编译工作。广大史学工作者正以高度的民族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努力做好清史编纂工作,科学总结历史经验,继承和弘扬民族优秀文化,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服务。

世界各国从分散发展到趋于一体,大抵从 15 世纪、16 世纪开始,直至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形成了资本主义的世界市场和世界体系。清朝从 1644 年到 1912 年共延续了 268 年,这是世界历史发生深刻变化的重要转折时期。在这个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清王朝却依然以“天朝大国”自居,闭关自守,使封建社会的中国越来越落后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洋枪洋炮面前不堪一击;西方列强用大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使之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在 18 世纪世界历史的大变局中,康乾盛世不过是中国封建社会“落日的辉煌”,而到 19 世纪中叶鸦片战争后,清朝日益衰颓,已奏起了“落日的挽歌”。因此,研究清史,确定它的基本内容,以及确定研究它的基本理论、原则和方法时,不能脱离清王朝社会发展过程中世界正在发生深刻变化的广阔的社会历史背景。

在编纂清史时要有世界眼光,这已是广大史学工作者的共识。不仅要把清史放到世界历史的范畴中去分析、研究和评价,既要着

眼中国历史的发展，又要联系世界历史的发展进程，而且还要放眼世界，博采众长，搜集和积累世界各国人士关于清代中国的大量记载，汲取外国清史研究的有益成果，为我所用。正是从这一基本认识出发，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决定编辑出版“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编译丛刊”（以下简称“编译丛刊”）。

清朝建立之初，与世界各国保持一定程度上的接触。后来中国的大门一度被关闭而后又被强行打开，这期间，外国的传教士、商人、外交官、军队、探险家、科学考察队蜂拥进入中国，东方中国的一切都使他们感到惊奇。基于种种不同的目的，他们记录下在华的所见所闻。这些记录数量浩瀚，积存在世界各国的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或私人手中，成为了解清代近三个世纪历史的珍贵资料。由于西方人士观察、思考和写作习惯与中国不同，他们的记载比较具体、比较广泛、比较注重社会的各个阶层各个方面，因而补充了中国史料记载的不足。“编译丛刊”将从中选取若干重要资料译介绍给国内的读者；对早年问世的具有开拓性、奠基性价值，但不为中国学术界所熟知的作品，我们也将同样给予关注；此外，对反映当代国外清史研究新的学术思潮、前沿问题、热点问题和重要成果的学术专著，“编译丛刊”也将及时地介绍给中国学术界。

从中国史学的历史与现实出发，有选择地介绍国外新史学的一些理论与方法是必要的。如西方历史学家提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历史学的界限变得越来越模糊了”，主要是强调扩大历史学家的视野，拓宽历史研究的选题；又如提倡“自下而上看的历史学”，努力将社会精英的历史变成社会大众的历史，将千百年来隐藏在历史幕后的社会大众推上历史的前台。此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历史研究整体化趋势的推动下，出现了一系列历史学分支学科，如社会史、人口史、民俗史、新经济史、新政治史、心理史、社会生态史、环境史、妇女史、城市史、家庭史等等，对于纂修清史有一定的

借鉴作用,这些都将在“编译丛刊”的作品中有所体现。

人类的文明史就是一部不同文明间不断交流和融合的历史。任何国家的文化都是通过与异质文化的对话和交流获得营养,从而不断发展壮大。纂修清史必须排除闭关自守的文化排外主义的干扰,破除中西对立的僵化思维方式,以开放的胸襟、兼容的态度和科学的精神对待国家清史研究的一切成果,因为它们既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原“编译丛刊”在新世纪中外文化交流的广阔背景下,作为一座科学的桥梁、友谊的桥梁,为纂修清史做出更多的贡献。

于沛

2004年5月

## 致 谢

对袁世凯政治权力迷局产生兴趣要追溯到 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我在耶鲁大学参加芮玛丽、刘广京两位教授举办的研讨班。在刘教授的指导下，我初步打算将这项研究作为我在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就读博士的论文选题。第四章、第五章关于北洋军和警务改革的内容草稿在《亚洲研究》1973 年 5 月第 32 卷第 3 期第 580—602 页和《清史问题》1975 年 12 月第 3 卷第 4 期上发表过。

十余年来，需要感谢的个人和机构很多，在此先从机构开始表示感谢：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历史系、伦敦历史档案馆、东京东洋文库、台北“故宫博物院”、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大学服务中心（香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中国研究与东亚图书中心。在紧要关头，美国学术团体协会给我提供的资助和亚利桑那州立大学提供的教师资助金和学术假期，使我能够全心从事研究和写作。我的父母塞勒斯和海伦·麦金农一如既往地给予了非常慷慨的支持。还有一些在不同时期对我的所有草稿审读并提出修改意见的重要人士，他们是刘广京、欧内斯特·杨、魏斐德、爱德华·罗德、理查德·史密斯、戴福士和简·麦金农。查尔斯·海弗德和我的同事田浩也时常



对我草稿中的部分内容提出建议。这些人提出的建议和评论都是非常珍贵的。

最为感谢的是刘广京和简·麦金农，他们的鼓励和支持对我保持持之以恒和精益求精的精神起了重要作用。我还要感谢丽贝卡·麦金农、赛勒斯·麦金农和艾格尼丝·史沫特莱的耐心。最后，在出版方方面，我和萨拉·凡博伦、安格拉·叟、菲利普·林塔尔、约翰·瑟维斯以及加州大学出版社的同仁合作得非常愉快。

斯蒂芬·R·麦金农

# 目 录

导言 .....	1
第一章 袁世凯的崛起 .....	12
第二章 稳定直隶:袁世凯担任直隶总督初年(1901—1903年) .....	36
第三章 袁世凯控制北京的朝政与外交(1903—1907年) .....	61
第四章 袁世凯与北洋军(1901—1907年) .....	88
第五章 直隶的改革和权力运作(1901—1907年) .....	133
第六章 袁世凯担任军机大臣和外务部尚书(1907—1908年) .....	174
第七章 结局:袁世凯下台 .....	196
结束语 .....	204
参考书目 .....	216

## 导 言

重新评价晚清时期中国政治权力结构，一个主要问题是中央权力的扩张和帝国主义作为一种国内力量的增长。本书关注的重点是袁世凯的政治权力。袁是一名在 1901 年后几乎控制了清廷和官僚政治的中国官员。<sup>①</sup>

在芮玛丽关于“同治中兴(1862—1874 年)”具有开拓意义的著作出版 20 年后，我们对晚清时期(特别是在中央政府层面上的)中国正式的政治权力结构的认识依然是支离破碎的，而且充斥着陈词滥调。<sup>②</sup>经过对农民起义、秘密结社、革命民族主义运动(国内和国外的)、城市化、知识分子、改革(政府机构、经济和教育方面的)、外交政策以及省级和地方上的士绅精英进行分析，我们发现在晚清最后十年(1901—1911 年)情况尤其如此。相对而言，我们对依然由京师控制的清朝政治和它所承受的内外压力的性质以及在世纪

① 这里的政治权力，我指的是袁世凯对于政府在政策以及资源的使用方面个人的决定性影响。这个定义来自于哈罗德·拉斯韦尔和亚伯拉罕·开普兰的《权力与社会：政治研究的框架》(纽黑文, 1950); 克律格的《权力和责任：历史的假设》，载克律格与弗里兹·斯特恩等编的《权力的责任》(纽约, 1967), 3—35 页。

② 芮玛丽：《同治中兴：中国保守主义的最后抵抗(1862—1874)》(斯坦福大学出版社, 1957)。

之交中国正式的政治权力结构如何发生改变知之甚少。

例如，帝国主义，尽管一直被公认是中国近代历史的重要主题，但是很少有人系统地分析它对国内政治权力结构产生的影响。<sup>①</sup>在美国，学者们常常认为西方和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造成的破坏性影响更多的是心理和精神上的而不是经济上的。他们举出在条约划定的通商口岸以外缺少外国对中国经济产生显著影响的证据，认为外国企业刺激了而不是阻碍了中国资本家和政府改革者的努力，强调朝廷在捍卫中国对领土和经济企业行使法律主权方面获得了成功。他们得出结论认为，中国的民族主义更应该被理解为对帝国主义情绪上和思想上的反映，而不是被经济现实催生的政治力量。<sup>②</sup>反方观点则主张情况正好相反：外国经济实力对中国进行的渗透不断加强，通常对中国经济带来了严重的抑制性和破坏性影响，通过金融颠覆，逐步侵蚀中国对经济 and 领土的控制。<sup>③</sup>尽管双方都顺便提到过，帝国主义对晚清政治施加的能感知到的、不断增长的压力，但是这些问题却很少被认真探讨过。考虑到近年来西方关注的依附理论（或者不发达国家的发展史），这一点就更加令人感到吃惊。在中国研究中

① 关于民国早期历史的研究，有两个明显的例外，他们是欧内斯特·杨的《袁世凯的统治：中华民国初年的自由主义与独裁政治》（安娜堡，密歇根大学出版社，1976）和爱德华·弗里德曼的《后革命到革命：中华革命党》（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74）。

② 关于这种观点比较成熟的、概要形式的陈述，可参看罗兹·墨菲的《外来者：西方在印度和中国的经验》（安娜堡，密歇根大学出版社，1977）。这方面的代表著作还有侯继明的《外国投资与中国经济发展：1840—1937》（哈佛大学出版社，1965）、石约翰的《帝国主义和中国的民族主义：德国在山东》（哈佛大学出版社，1971）、费维恺的《20世纪初外国在华企业》（密歇根大学出版社，1976）。

③ 严中平的《中国棉纺织史稿》（北京，1955）是这一思想流派的代表作。迄今为止这方面的论述可参看让·谢诺和玛丽安·巴斯蒂编的《中国：从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纽约州立大学出版社，1976）。关于这场争论的综述，可参看《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交锋》，载于《亚洲问题学者通报》第4卷4期（1972年12月），2—16页；也可参看《中国经济史论文集》，载于《近代中国》第4卷第3期（1978年7月），251—369页。这方面比较温和的看法可参考罗兹的《中国的共和革命：以广东为例，1895—1913》（哈佛大学出版社，1975）。

该理论有助于呼吁更好地理解晚清时期外国渗透对中国政权产生的影响。<sup>①</sup>实际上就我所知,自中国学者胡绳和邵循正具有开创意义的著作出版以来,还没有人系统地研究过帝国主义对晚清政治权力机构的影响。<sup>②</sup>

西方和日本在华势力尤其在1900年以后迅速增长的事实,已经得到了普遍承认。贸易赤字非常严重,外国对近代交通业、重工业和近代银行业的控制不断加强,传教士不断涌入。在华居住的各类外国人从1895年的10091人增加到1913年的163827人,同时期外国在华企业从603家增加到3805家。英国及其盟国日本对中国的投资处于领先地位:从1902年到1914年,英国的投资额从2.603亿美元猛增到6.075亿美元,而日本的投资额从几乎为零增加到2.196亿美元。

到1900年,西方和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已经达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并引发了严重的政治危机。在1894—1895年中日战争中,清政府损失了绝大部分海军舰队、“台湾”主权和对朝鲜的宗主权。五年后,作为对1900年义和团农民起义和围困外国公馆的回应,八国联军(包括俄、德、英、美和日本)等国占领并洗劫了京师和天津,清廷被迫流亡。在此期间,清政府的绝大部分地面残余部队都被消灭,而且列强索要的巨额赔偿(4.5亿两白银)比清政府每年财政收入的四倍还多,这迫使清政府不得不以每年“国内税关”的收入作

① 维克多·里皮特:《中国的欠发展》,载《近代中国》第4卷第3期(1978年7月),280—284页;李思勤的评论,同上,364—366页。关于两大经典依附理论,可参看韦伯:《发展与欠发展的政治经济》(纽约,1973)以及弗兰克:《拉丁美洲的资本主义与欠发展》(纽约,1967)。

② 胡绳:《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香港,1948),邵循正:《辛亥革命前五十年间外国侵略者和中国买办化军阀官僚势力的关系》(北京,1955),《历史研究》(1954年8月):53—64页。

抵押还债。到义和团起义时北京在军事上和在财政上都陷入了毫无防守之力的困境。

帝国主义在义和团运动后期对晚清政治权力结构施加影响的深刻程度，还没有得到很好的理解。除了沉重地打击了清政府外，义和团起义以及随之而来的联军占领京畿地区，使列强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干涉京师和各省决策的机会。外国的支持对于像袁世凯、张之洞这些省级主要官员的政治地位非常重要，这是本书要详细探讨的重点。

改革是帝国主义在义和团运动后十年间影响晚清政治的另外一个方面。1901年列强以要求清政府特别是在对外关系方面进行大刀阔斧的现代改革为条件，将京师归还给清政府。为了兑现承诺，朝廷启动了一系列制度改革，又称“新政”，诸如废除科举制度，将传统的六部重组为包括外务部和商部在内的11个现代政府部门（这11个政府部门是外务部、吏部、民政部、度支部、礼部、学部、陆军部、法部、农工商部、邮传部、理藩部——译者注）。在京师之外，重点放在实现军队和教育体系的现代化上，在这十年末重点又放在实施地方自治和宪政改革的实验上。在许多人看来，后者的政治改革如此激进，以致清王朝在1911—1912年以不流血的方式突然垮台了。<sup>①</sup>

依笔者之见，不断增强的西方和日本帝国主义势力意味着清政府加强了控制力度。外国军队的直接干预最终平息了华北的义和团起义。但是随后，为反抗伴随新政改革和外国索赔而产生的新税，农民起义继续爆发。各省政府因为担心西方使用具有绝对优势

---

① 参见莫理循的《儒家官僚政治的现代化：公共管理的历史研究》（拉德克利夫学院博士学位论文，1959）；芮玛丽：《革命中的中国：第一阶段，1900—1913》（纽黑文，耶鲁大学出版社，1968）一书中的导言；以及罗兹的《中国的共和革命》。

的武器进行报复,迅速而残酷地镇压了这些起义。<sup>①</sup>因此自相矛盾的是,尽管清王朝在军事上屈服于外国势力,却因为得到西方的支持和独家提供的西式武器,国内的安全维持得相当好。袁世凯对待农民需求以及叛乱的态度可能是官场中的典型。在给皇帝的奏折中,袁世凯写道:大多数中国人包括儿童在内需要训练和养育。<sup>②</sup>实际上,正如我们将会看到的,他把他们当做需要严加控制的、可以支配的物体,并时刻保持警惕,防止义和团或其他排外运动在乡村死灰复燃。

正如欧内斯特·杨对1911—1912年革命作的解释所说的那样,在当代人和历史学家中普遍存在着一种夸大袁世凯政治权力范围的倾向,甚至夸大到认为他成功地掌控了晚清和民国早期的政府政策、资源以及人事安排;<sup>③</sup>把袁世凯塑造成中国近代军阀主义和军国主义之父的形象,甚至认为他的政治影响力和风格一直延续到1916年他去世之后,在有些方面甚至持续到了现在。<sup>④</sup>通常这些把

① 《辛亥革命五十周年纪念论文集》(北京,1962)第1卷,115—146页、204—228页;李治文等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北京,1957)第1辑,946—968页;欧内斯特·杨:《袁世凯的统治:中华民国初年的自由主义与独裁政治》,18—19页,他在书中列举了日本学者在这方面丰富的研究成果。也可参看让·谢诺编:《中国群众运动与秘密社团,1840—1950》(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72),160—170页。此外,还有以湖南和湖北地区为个案进行的研究,参看周锡瑞的《改良与革命:两湖之辛亥革命》(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76),106—142页。

② 《袁世凯奏折》,605页。

③ 欧内斯特·杨:《袁世凯登上总统宝座》,载芮玛丽编的《革命中的中国:第一阶段,1900—1913》,419—442页。

④ 例如,可以参考陶菊隐的《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北京,1957—1958);韦慕庭的《国民政府的军事割据与再统一过程》;何炳棣和邹谠主编的《危机中的中国》(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68)第1卷第1册,203—220页;黎安友的《北京政治,1918—1923:派系主义与立宪的失败》(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76);齐锡生的《中国的军阀政治,1916—1928》(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76),第2章;戴安娜·拉里:《地区与国家:中国政治斗争中的桂系,1925—1937》(伦敦,1974),1—20页;惠特森:《中国的高层指挥:共产党军事政治史,1927—1971》(纽约,1973)。

袁氏看做军事强人的观点是认为晚清政治权力具有特殊性和地区性，这正是需要认真研究的问题。

这项研究的目的是之一就是挑战 20 世纪 30 年代罗尔纲率先提出的观点。罗氏认为在 1911—1912 年之前袁世凯大权在握，表明 19 世纪 50 年代和 60 年代太平军起义和捻军起义后，中央政府的权力不断流失到地方督抚手中的模式已经形成。从袁氏的个案看，据说他权力的主要来源是他在担任直隶总督期间培养的、由他个人控制、以地区性为基础的北洋新军，但关于袁氏权力的这一观点从未被文献详细地记载下来。相反，出于解释军事主义、军阀主义兴起以及 1916 年袁世凯去世后朝廷权力衰落的需要，有必要把对晚清政治权力机构的解释纳入 19 世纪和 20 世纪中国政治史的解释模式中来。<sup>①</sup>

十多年前，学者们开始对罗教授关于太平军刚结束时期所提出的有效性观点产生了严肃质疑。<sup>②</sup>例如，王尔敏认为，在镇压 19 世纪中期的太平军起义中起过重要作用的湘军和淮军实际上并非地方军队，这两支军队都有相对特设的组织结构，其地区性特点并不明显。湘军于 1853 年在湖南创建，1864 年被解散，余部散布在华南地区。除了部分军队在 1866—1868 年的剿捻战役中被调用外，淮军从未驻扎在安徽地区，安徽只不过是这支军队大多数士兵和军官的故乡而已。淮军的创始人和统帅李鸿章，在他 1870 年被任

① 罗尔纲的《清季兵为将有的起源》，《中国社会经济史集刊》（1937 年 6 月），235—250 页；《湘军新志》（长沙，1939）。关于罗尔纲观点的最具有学术意义的著作是波多野善大的《北洋军阀的发展历程》（1953），211—262 页，以及其发表在《中国近代军阀研究》（东京，1973）一书中的另外一些重要的论文。英文代表作是拉尔·鲍威尔的《1895—1912 年中国政治权力的兴起》（普林斯顿，1955）和弗朗兹·米歇尔的《19 世纪中国的地方主义》，此外还有斯坦利·斯宾特的《李鸿章与淮军：19 世纪地方主义研究》（西雅图，1964）。

② 王尔敏：《淮军志》（台北，1967）。也可参看芮玛丽对斯坦利·斯宾特的著作《李鸿章与淮军》所作的书评（载《亚洲研究》1966 年 2 月，331—333 页），以及刘广京的《晚清时期地方权力的局限》（载《清华汉学研究》1974 年 7 月 10 卷 2 期，176—223 页）。



命为直隶总督时,只有其中三分之一的军队随他前往直隶,其余军队他无法直接控制——过半淮军驻扎在山西,其余的分散在江苏、湖北和陕西省。而且,无论湘军还是淮军在财政上都没有独立于中央政府,对这两支军队,中央政府至少拥有和曾国藩或李鸿章同等重要的管理权。在这种条件下,重新审视 1901 年到 1909 年间袁世凯军事基础的时机已经成熟。

最近日本学者从事的关于 19 世纪政治和社会情况的许多富有开拓性的地区性研究中,出现了更多反对罗尔纲观点的看法,对此,孔飞力作了精辟的总结。<sup>①</sup>按照孔飞力等人的观点,晚清权力结构的主要分界线不是在中央政府和省级政府或军队之间,而是在整个正式的政府机构(包括县级官员)和非正式的地方权力或者乡村中的下层士绅精英之间。当然,按照财富和教育背景来界定这些精英是一个关键而又复杂的问题,学者们作出的关于精英的定义和分类,几乎和关于这一问题的研究一样多,然而,人们普遍认为科举功名较低的(生员或者更低的)和有钱的地方知名人士构成了当地的精英。他们在数量上远远超过上层精英,并与之有很大的差别。这些下层精英出身于那些至少有一人或者多人考中较高科举功名的士大夫家庭,还常常通过财富与家族纽带与正式的官府官员有直接联系。和罗尔纲的观点大致相同的是,19 世纪在县一级,地方精英权力的兴起被看做是以牺牲正式的政府权力为代价的。为了论证其观点,孔飞力阐述了以太平军起义危机为催化剂,地方精英是如何通过组织团练或民兵以及对贸易征收厘金税这些特定方式掌握乡村的税权和军事权力的。在最后一章,孔飞力强调政治权力向地方精英手中累积的现象一直持续到 20 世纪。后一种看法已经被从事庚

<sup>①</sup> 孔飞力:《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1796—1864 年的军事化与社会结构》,(剑桥大学出版社,1970)。